

上海侨史论丛

上海市华侨历史学会编



序 言

吴 泽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支脉的民族。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侨，都是从中国迁移出去侨居国外的炎黄子孙，都是和中华民族血肉一体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中华民族是华侨赖以生育的唯一母体。近几十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的日益富强，广大海外侨胞、不仅人数众多足迹遍五大洲，显示着中华民族支脉纵横、根深叶茂的兴盛气势；而且在侨居国勤劳振奋，为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中华文化优良传统的传播，为中国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增强，为祖国和家乡的繁荣昌盛，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为祖国、民族赢得国际荣誉。我们广大侨胞的如许光辉业绩，理应彪炳史册，垂教古今。我们史学工作者理应立足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现实，面向世界，多多关注广大侨胞们在世界人类社会历史所作出光辉业绩的历史实际，及时深入开展华侨史的专史研究，做出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并促使通史性著作，能予华侨史应有的地位，成为名副其实的科学完篇。我们的侨史研究工作，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

研究华侨史工作，关系到国内人民对海外同胞的深入了解和正确认识，关系到政府有关部门侨务政策的制定，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关系到激励广大华侨、归侨、侨眷以及海外华人的积极性，使之进一步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积极支援祖

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搞好侨史研究工作，既具有重大历史意义，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华侨史研究工作，在国内经历了几十年的历史。本世纪初的前二十年，华侨史研究开始起步，到了四十年代中期，有所发展；以后，曾出现了一段迟滞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华侨史研究开始出现了一番新景象，特别是近几年，全国各地先后创立起华侨历史学会和华侨史研究机构；有些高等院校还开设了华侨史的专题讲座和专业课程；国内、外华侨史研究的学术活动也空前频繁；侨史的报刊和专著不断问世，科研成果，硕果累累。华侨史研究出现了蓬勃兴盛的新局面，华侨史研究迈进了一个新时期，确是令人欢欣鼓舞。

上海的华侨史研究工作，在近年来也有较好的发展。1983年年底，上海华侨历史学会正式成立。成立以来的几年里，进行了许多各种形式的学术活动，诸如举行年会、学术讨论会、召开专题报告会，邀请外国侨史专家学者进行学术交流活动，应邀出国讲学等等，近年来，还着手编写华侨华人辞典。这次由学会负责编辑出版的这本《上海侨史论丛》，也是上海华侨历史学会学术工作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这本论文集中论文作者，都是上海华侨历史学会的成员，都是企望对目前华侨史研究领域中的许多学术问题，进行些纵、横向的具体探讨，对我国华侨史研究能起到些抛砖引玉的积极作用。如果正能如意所望、这本论文集的问世，那就可谓不无裨益了。

华侨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确是有许多艰苦工作待做。上海华侨史研究工作者有决心和全国同行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开展这项工作。同时，上海华侨历史研究工作者衷心希望国内、外有关侨史的专家学者们继续给我们更多的帮助和更

多的指导，使我们的侨史研究水平有所长进，使我们这本论文集的第二集的内容和质量能有所改进，编得好一些，高一些！

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二日

上海侨史论丛(第一集)目录

- 序 言.....吴 泽 (1)
- (一) 抗战期间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刘良模 (1)
- (二) 对廿世纪中国研究东南亚史和海外华人史的情况介绍和几点意见.....姚 楠 (5)
- (三) 近百年来越南华侨的遭遇.....林 莺 (25)
- (四) 海外洪门述略.....俞云波 (34)
- (五) 近代南洋华侨体育一瞥.....黄瑞球 (50)
- (六) 关于华侨史开端的初探.....施子年 (59)
- (七) 国共合作与华侨、华人.....曹 前 (69)
- (八) 旅日华侨的历史和现状
——从一些统计数字看旅日华侨社区的变化及其发展趋势.....陈昌福 (93)
- (九) 试论战后美国华人的科技成就及其取得成就的原因.....沈立新 (123)
- (十) 中国革命与华侨
——对陈嘉庚研究的再认识.....舒志超 (142)
- (十一) 日本函馆华侨经营海产品输沪的兴衰史.....陆志谦 张宪庭 (165)
- (十二) 南洋维新派中坚——富豪诗人邱菽园.....王清泗 (174)
- (十三) 巴人春秋.....何 戎 (184)

- (十四) 上海华侨史研究概述……………曹 前 (202)
- (十五) 上海市归侨、侨眷概述……………陈如璧 (203)
- (十六) 中国最早的华侨组织——华侨联合会
……………金建华 (212)

附 录

- 一、上海市华侨历史学会工作概况…………… (216)
- 二、编纂中的《海外华侨、华人名人词典》简介…………… (219)
- 三、海外华人、华侨的分布情况表……………罗炳枝 (221)

编辑：林 莺

罗炳枝

抗战期间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谊

刘 良 模

一九四〇年夏天我到了美国。我去美国，是因为由于我在抗战前后，在祖国各地推广抗日救亡歌曲，引起了蒋介石反动派对我进行政治迫害，使我只好离开祖国，到美国去。

那时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三年多。到了美国，我发现美国的广大人民对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十分同情，十分支持。我这个刚从中国抗战前线到美国的人，成了深受他们欢迎的人。他们要我告诉他们，中国人民是怎样进行抗日战争的，为什么中国人民对于抗日战争有必胜的信心。总的说来，他们对于中国人民能拿起枪杆子抵抗日本侵略者，而且已经打了这么久，他们是非常钦佩的。

那时，我住在纽约。当时有一些同情中国人民抗战的美国人组织了支援中国人民的团体，其中有援助中国协会（China Aid Council）、美国医药援华会（American Board of Medical Aid to China（简称ABMAC），这两个团体都是同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女士有关系的，他们征募到的药品和款项都是送给孙夫人转送给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其他方面的。他们这些团体也设在纽约。

在一九四一年底，日本军国主义者偷袭珍珠港以后，美国正式向日本宣战。此后，几个美国人民支援中国抗战的团体就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总机构，叫作援华会（United China Relief），他们需要有人去向各地的美国人民报告中国人民是

怎样进行抗日战争的。他们邀请了我担任这个工作。于是我就做了援华会正式讲员。

作为援华会的讲员，我一年四季走遍了美国的大小城镇，向美国各地的商会、扶轮社、狮社、教会、大学、中学和小学等，讲中国人民是怎样进行抗日战争的。我也在广播电台上作这样的报告。

我接触到美国广大的人民，包括家庭妇女和小学生。我把我自己的感受告诉他们。我说，我坚决不愿意做日本帝国主义的奴隶，广大的中国人民同我有同样的心情。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我们，我们中国人民就拿起武器来同他们拼。我们的武器虽然没有日本的武器那么精良，但是我们抗日的意志是坚强的。中国人多，有四万万，日本人少，何况中国是个大国，日本帝国主义绝对征服不了决心抗战的中国人民。我把我在抗战前线看到的情况告诉他们：中国的军队是怎样前仆后继地进行抗日的，后方老百姓又是怎样冒着枪林弹雨送茶送水、送弹药到前线的，又是怎样把伤员用担架从火线上抢救下来，送到后方的。在被敌人占领的农村，我们聪敏勇敢的人民进行巧妙的游击战打得日本鬼子和汉奸寝食不宁，损兵折将；而在敌人占领的城市里，中国人民对日本侵略者进行地下斗争。总之，日本侵略者是战胜不了要抗战到底的中国人民的，而中国人民最终必将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我不但把中国人民进行抗战的情形讲给美国人民听，还对他们讲了中国人民抗战必胜的道理，并且还把中国人民的抗战歌曲，象《义勇军进行曲》等，唱给他们听。这样使美国人民更加踊跃地出钱出物来支援中国人民神圣的抗战。美国人民看到，中国的人民并不是可怜的人民，而是英勇善战的人民，是值得美国人民支援的人民，我看到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谊是真诚的，他们当时对我们中国

人民的支援是源源不断的。

应当看到，在中国人民抗战胜利之后，支持蒋介石反动派在中国打内战的只是一小撮反动的美国政客和垄断资本家。在中国人民打倒了蒋介石反动派，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他们失败了。他们现在虽然不甘心失败，还在那里不光彩地搞“两个中国”的丑剧，他们想要阻止台湾回归我们的祖国，但那是注定要失败的。

在那个时候，美国有个著名的黑人歌唱家，名叫保罗·罗勃逊（Paul Robeson）。他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象西班牙人民的反对佛朗哥法西斯统治的斗争，非洲各国人民的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斗争，他当然也同情和支持我们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我到美国以后，我渴望能见到罗勃逊。在一九四一年春天，通过一个朋友的介绍，我终于见到了罗勃逊。他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人。我们一见如故。我把中国的抗战歌曲都唱给他听，而他最喜欢的就是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不用多久，他学会了这支歌，他不但用英文唱它，而且能用发音非常准确的中文，用他声如洪钟的歌喉，唱出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雄壮歌声。罗勃逊不但学会好几国文字，象法文、德文、西班牙文、希伯来文和非洲各国的民族语言，他也认真地学习我国语文，不但能讲，而且能写。他把《义勇军进行曲》叫作《起来！》，因为它的第一句就是“起来！”于是罗勃逊就把《起来！》放在他到美国各地举行音乐会的节目单上，他走到哪里，就把《起来！》唱到哪里。于是《义勇军进行曲》成了当时美国人民很熟悉的一支歌曲。罗勃逊的音乐会往往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他唱给大家听，第二部分由听众点唱。在他音乐会的下半场，我们常常可以听到美国的听众高呼着“起来！起来！”，要求台上的罗勃逊唱这支

中国人民的抗战歌曲给大家听。

在一九四二年，我所组织的纽约华侨青年歌唱团同保罗·罗勃逊一起灌制了一套中国抗战歌曲的唱片集，就叫作《起来！》。出售这套唱片所得的钱，就用来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我在美国将近十年，从一九四〇年一直到一九四九年，我到过美国的东南西北，我接触过成千上万，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的美国人民，我所得到的一个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美国人民是我们中国人民真正的朋友。

对二十世纪中国研究东南亚史和海外华人史的情况介绍和几点意见

姚 楠

(本文是一九八六年作者应香港中文大学邀请,在该校所作演讲稿,后列为该校当代亚洲研究中心研究报告第十号,经修订后又发表于复旦大学授予“郑子瑜顾问教授证书纪念论文集”现转载于此,以供研究海外华人史的专家、学者们批评指正)。

首先要说明一下,我在这里把东南亚史和海外华人史放在一起讨论、是因为这两个学科有密切关系,近百年来中国对东南亚史和海外华人史研究的发展也几乎是齐头并进的。我们研究东南亚史而不涉及东南亚华人史、那是不完整的,而海外华人主要集中在东南亚。据粗略的估计,截至八十年代初、海外华人总数大约有二千四百万人,其中东南亚华人约占百分之八十以上。所以,我想把中国研究东南亚史和海外华人史放在一起介绍、还是可以的。当然,两者不可能合而为一,有时还须要分开来谈。譬如,海外华人史一般只从十九世纪末讲起、而东南亚史的研究,就不得不略为追溯到古代。

其次、还要说明一下,我所谈的只是中国大陆方面的情况,对台湾和港澳方面的研究情况,我不熟悉、所以没有发言权、尚有待于有关学者的补充。

西方学者研究东南亚各国早期史时，除了利用当地考古资料 and 有关史籍外，必须参考中国史料。英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在国际上被推崇为东南亚史权威的霍尔教授讲过一句中肯的话。他说：“要获得关于东南亚原始历史的任何知识，中国史料是不可缺少的，但是这些史料使研究工作遇到可怕的困难。”所以，有人说，中国对东南亚史的研究是“沙漠”，那是不正确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近一两百年来，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在研究组织、资料利用和调查考察等方面，确实落后于西方人和日本人，当然也包括东南亚各国的学者在内。

我在别处已经介绍过二十世纪以前中国对东南亚史的研究、现在我主要是想谈二十世纪初以来的情况、所以对过去的情况只能简单地回顾一下。大家知道，在中国的正史、实录、类书、档案、地方志乃至民间的诗歌和文学作品中，都有大量的有关东南亚史资料。这些资料正在被中外学者所利用，中国学者还在整理汇编注释，取得一些成果，这里我不准备详细介绍。除此以外，还有关于东南亚史的各种专著，我认为这些专著大致可以分为四类：

（一）由中国派往国外的政治使节或其随从人员所写的笔记和回忆录，著名的如三国时出使扶南的朱应和康泰所著的《扶南异物志》和《吴时外国传》、元代周达观所著的《真腊风土记》，以及明代随郑如下西洋的马欢，费信和巩珍所著《瀛涯胜览》、《星槎胜览》和《西洋番国志》等。

（二）到西天取经求法的僧侣所写的旅行见闻，著名的有东晋僧人法显所著的《佛国记》、唐代僧人义净和玄奘所写的《南海奇归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大唐西域记》等。

（三）航海家、旅行家等所写的游记和回忆录、如元代汪

大渊所著的《岛夷志略》，清代王大海的《海岛逸志》谢清高的《海录》、李钟珏的《新加坡风土记》等。

（四）从事对外工作或接触有关东南亚史料较多的人所写专著，其中最著名的是宋代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和赵汝适的《诸蕃志》，明代张燮所著《东西洋考》、清代陈伦炯的《海国闻见录》等。

以上所提到的一些专著，只是一小部分，这些资料虽然并非完全记述东南亚的情况，但其中确有不少宝贵资料。这些专著，有的已有外文译本、有的已有中文校注本，可以说，凡是研究东南亚史，包括东南亚华人史的，都要用到这些书作为参考。

还要顺便提到两本记载海外华人情况的书籍：一本叫做《开吧历代史记》，记载荷兰人早期统治印度尼西亚情况和当地华人社会的主要活动，从1610年起一直记载到1798年止，属于编年史性质。一本叫做《兰芳公司历代年册》，记述十八世纪中叶华人罗芳伯等在西加里曼丹开发金矿、建立行政组织以及他们与荷兰殖民者对抗的情况。这类书的史料价值很大、而且说明了海外华人的历史决不是始于十九世纪末而是从很早的时期起就开始罢了。

对于二十世纪以前中国对东南亚史研究的大概情况，就简单介绍到这里。不过我提醒一下，中国史籍中记载东南亚和海外华人情况的资料、固然浩如烟海，但如何选择使用，必须十分谨慎，也必须加以分析，否则将会形成错误的认识。

在谈二十世纪的时候，不免要同十九世纪联系起来。事实上，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同西方各国的交往多起来，于是像清朝出使英国的大臣郭嵩焘、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薛福成等所写的笔记中、都注意到了东南亚和海外华人。新加坡华侨

所办华文日报《叻报》于1881年创刊后，有关当地华人的历史记载发表得更多。但是，这些文章都不过一鳞半爪地谈到海外华人。看来，纯粹论述海外华人的专著只能以梁启超在1904年发表于日本横滨《新民丛报》的《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为最早。在这篇文章中，他赞扬那些在东南亚称王称霸的华人，把他们与西方殖民者相比。虽然严格地说，这篇文章不能算是历史著作，但它至少涉及海外华人史，而且影响不小。它的发表，已是二十世纪初的事了。到了1910年，日本东京的《民报》上发表了一篇真正以“华侨史”命名的著作，叫做《南洋华侨史略》、作者的本名是易本羲、笔名为“羲皇正胤”，他曾在爪哇三宝垄的一所华文学校里教过书，所写的这本华侨史，依据文字记载和口述材料，大部份涉及荷兰和英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全书共有九章，另有前言和结束语。这部著作的民族主义色彩很浓。它的写法和以后几十年中发表的华侨史大致相同，有人认为，“华侨”这个名词的出现和使用、与清末革命运动与保护侨民政策有关，还把“华侨”与“殖民”联系起来。从梁启超的《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到三十年代出版的《中华民族拓殖南洋史》和《中国殖民史》的书名来看，人们产生这种想法是很自然的。原因在于上述这些书的作者都以强烈的民族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而事实上中国人移居海外，与西方各国的殖民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尽管有人在海外发迹，甚至成为当地的统治者，但他们的出洋，至少没有得到本国政府的保护，还被认为是“流寇”或“不遵王法”之人，所以，为了避免混淆不清，我以为作者用“殖民”来作为书名或文章题目是不恰当的，用了这个名词而又要解释中国的“殖民”与西方国家的“殖民”不同，就无法说清楚了。至于“华侨”这个名词最早在

什么地方出现，目前尚无定论，一般认为大量使用这个名称在十九世纪末以后，对此我没有异议，不过这两个字是否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具有法律上和政治上的特定含义，那还值得商榷。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中国对东南亚史和海外华人史的研究是我亲身所经历，所以比较容易谈。

首先要提到的是何海鸣在1921年创办《侨务旬刊》。当时东南亚华侨人数激增、主要是由于西方殖民国家在东南亚的势力范围已经明确划分、在殖民地大规模掠夺经济资源、需要大批廉价劳动力、华工是最合适的对象，因而华人前往的日益增多；另一方面、华人在东南亚各地艰苦创业、惨淡经营，有一部份人已致富发达，他们的经济地位有所提高，社会组织也逐渐健全，汇款回国赡养家属的数目可观，有的华侨还在国内投资创办企业，引起中国政府的重视。那时中国人在日本留学的为数不少，受到日本人对本人东亚南亚研究的影响，对东南亚与海外华人逐渐感到兴趣。《侨务旬刊》就是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主持《侨务旬刊》的何海鸣，不是广东或福建人而是内地的湖南衡阳人，他并没有出过国，但在北京平民大学领事系讲过“海外华侨拓殖史”（他用“华侨拓殖”的提法，可能受梁启超和日本方面的影响）。这个刊物的总社设在北京、分社设在上海，并在东南亚的北加里曼丹、马来亚以及美国的芝加哥设有海外分部，联系面较广。它在1921年4月7日创刊，持续四年，共出一百四十一期。内容有通论，侨务新闻、文艺、附录等栏，其中有时刊载一些有关东南亚和海外华人史料的文章，并出版专辑，如上面提到的《南洋华侨史略》和《开吧历代史记》，就分别转载在该刊第五十九期和一百二十期。所以说，该刊可以称为研究东南亚史和海外华人史的先驱。

接下来就要谈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了。国外学者往往

把这个机构称作南洋研究所，其实不然，它的名称叫做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一度还称作南洋美洲文化教育事业部，简称为南洋文化部。它的组织比较特别，也不是以研究为主要任务，而是以宣传出版为主，当然在宣传出版任务中，也包括研究工作。情况是这样的：1927年国民党军队打败军阀政府的军队，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设有侨务委员会，暨南大学的前身是暨南学堂，这时扩大为综合性大学，校址设在上海郊区一个叫做真如的地方，第一任校长郑洪年，是铁道部政务次长，原为孙中山的随从人员。这所学校号称华侨最高学府，除招收大学本科生外，为了便于华侨子弟入学，设立中学部，另外专门设立一个对海外宣传联络的部门，由校长直接领导。这个机构就是上面所说的南洋文化部。它出版刊物、但也研究一些海外情况、最主要的是东南亚的情况。当时还没有研究人员的职称、南洋文化部设主任一人，相当于大学的系主任，其下有秘书一人，编辑和特约编辑若干，翻译若干、其他工作人员若干人，职工人数最多的时候，总共有三十人左右。我本人是在1929下半年进这个机构担任英文翻译并兼任一些行政事务工作的。当时的部主任是广东兴宁人刘士木，日本留学生，后来和我一道在新加坡发起南洋学会，并曾当选过理事长。编辑和特约编辑中也有几个知名人士，如李长傅就是这个部创办时的编辑，有不少南洋史和华侨史专著，包括《南洋史纲要》、《南洋华侨史》和《中国殖民史》等，他在六十年代已经去世，另一位编辑陈希文，曾在日本工作过、后一度代理过部主任职务，新中国成立后，曾经担任过贵州大学校长、现尚健在，年已八十余岁。特约编辑张相时，写过一部当时很出名的《华侨中心之南洋》、年已九十二岁、现在云南省昆明市担任云南省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还是一位特约编辑温雄飞，担任过孙中山的机

要秘书，写了一本《南洋通史》，1929年在上海出版，当时在国内被称为一部最完整的华侨史，他已在七十年代去世。与我同事过的人中，学有成就的据我所知就是这几位先生，其后的情况不大清楚，不过似乎也没有什么毕生专门从事东南亚研究工作的人，南洋文化部的主要期刊叫做《南洋研究》，从1928年创刊起到1944年停刊止、断断续续出版了十一卷、共六十一期，另外出版丛书三十二种。所以说，这个机构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对推动东南亚研究工作是有较大贡献的。

与此同时，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还有一些东南亚史和海外华人史出版，在东南亚史方面，写作和翻译得最多的是冯承钧教授。他年幼出国，先后在比利时和法国学习，1911年毕业于巴黎大学法科，曾在北京大学等校任教。他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发表的有关东南亚史的著译很多，如《中国南洋交通史》、《占婆史》、《苏门答腊古国考》、《诸蕃志校注》、《星槎胜览校注》、《瀛涯胜览校注》、《马可波罗游记》、《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以及《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等十多种、都是研究东南亚古代史很有用的参考书。此外，北京大学还有二位教授，对东南亚史研究也有较大贡献。一位张星烺教授，他的最著名的著作是《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六编，从现在整理古籍的要求来衡量，质量不能算很高，但在当时能有这样的巨著，已是十分不易。为研究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史提供了不少参考资料。还有向达教授，曾在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不列颠博物馆，巴黎国家图书馆从事研究工作，回国后担任过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馆长，他长期收集中外关系史的文献资料，著名的著作有《蛮书校注》、《郑和航海图》、《西洋番国志校注》、《两种海道针经》等，不过这些书的出版，都已在五十年代了。